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创造『传统』

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

□ 江 湄/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创造“传统”

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

江 湄/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 / 江湄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

ISBN 978 - 7 - 5097 - 4584 - 7

I. ①创… II. ①江… III. ①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中国 - 清后期
②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中国 - 民国 IV. ①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508 号

创造“传统”

——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

著 者 / 江 湄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军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李建军

责任校对 / 师军革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84 - 7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22.25

字 数 / 35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编委会

顾 问 齐世荣 宁 可

主 任 郝春文

委 员 何 平 刘 城 李华瑞 梁景和

刘乐贤 刘新成 梁占军 史桂芳

宋 杰 魏光奇 徐 蓝 郝志群

袁广阔 晏绍祥 叶小兵 张金龙

各章内容提要

导论 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与“传统”的创造

概述本书的研究主题、基本内容、创新点和现实意义。

第一章 梁启超的“学术”观念及其儒学性格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嬗变之中，“学术”观念自身的转变是一个更具本质性的事件。梁启超对“学术”观念的现代转化和建构，是有着充分自觉的。本章论述，梁启超的学术事业是其“新民”和救国大业的有机环节，他对“学术”的理解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具有浓重的儒学性格。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力图将儒学为学之精义，重新植入中国现代学术的体质之中，在他看来，这是应对中国时局、救治现代文化之偏弊的一个关键。

第二章 “事上磨炼”的新道学——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及其思想意图

在《新史学》问世的同年，梁启超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但此后其主要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他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而以儒学为重点。本章考察“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史与儒学的重构及其背后的思想意图，分析他如何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如何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如何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指出梁启超力图发明一套适用于今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

的另类方案，却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第三章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本章通过细究同时文献，指出其“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离，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第四章 “齐物”世界中的“学术”“道德”“风俗”与“政治”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章太炎是倡导求真求是之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一方面自觉超越了兼知行而言之、以成德经世为旨趣的儒学式“学术”观念，另一方面又突破了现代学术以“真理”为职志而独立于“致用”的教义。本章以章太炎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述为基本材料，阐述章太炎以“齐物”论为理论根据，重新界定学术、政治、道德、社会之间的分界和关联，给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想。并进一步论述，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很难用“现代”与“传统”、“激进”或“保守”的现成框架来认知和解说，那将是对其人其学的极度简化。

第五章 章太炎“六经皆史”说本旨、意涵及其变化考论（上）——以《春秋》学三变为中心

经学消亡，其所述之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大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

降到了古史资料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思想轨迹。本章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试图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第六章 章太炎“六经皆史”说本旨、意涵及其变化考论（下）——兼论章太炎“经学”观念及其变化

本章紧接上章以章太炎的《易》学、《诗》学、《书》学、“三礼”学为中心，全面深入地梳理章太炎“古文经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呈现其中独特而丰富的意涵。着重论述章太炎论证“六经”是孔子“良史之学”，并固守东汉“古文经学”关于六艺经传的性质、作者、传授关系的传统说法，意在捍卫古文经传的信史性质，从而为中国历史文化确立“原型”。又进一步梳理、论述了章太炎一生“经学”观念的变化，以见章太炎的“经学”不断回应时代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第七章 胡适的“幽灵”——胡适研究与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思想动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在大陆学界持续引起热议，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世纪80年代，胡适代表的是“启蒙”旋律，尽管被“救亡”的革命主调压倒，但终于在历经变乱的中国大地上重新唱响；自90年代初期以来，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随着“反激进”思潮出场亮相，胡适升格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至圣先师”，警醒着国人近一个世纪以来陷入整体社会改造工程的乌托邦迷狂；而在“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之下，胡适的示范性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在当代中国，胡适的形象如同一个风向标，指示着近30年来某些重要的思想动向，也连带出一些引人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研究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趋势的重要一环。

第八章 “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胡适对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

“再造”

胡适讲出一套“文艺复兴”式的中国文化史叙事，将中国文化史描述成一个不断返本开新又不断走向“现代”的进化历程。在这一“宏大叙事”中，胡适及其“整理国故”运动处于关键的转捩点上，既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终点，又是中国“新文化”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胡适以他自己的思想价值体系为坐标，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一番“翻转”和“再造”，从而重构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全新的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尽管有先行者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进行“价值重估”，但胡适真正给出了一个新的“全面结构”和“全部系统”。本章最后提出讨论：我们怎样超越胡适式的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附录一 傅斯年的“中国大历史”

胡适有着一套“文艺复兴”式的中国通史观，与此相关的是，同样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傅斯年也有一套中国通史观和中国文化史观。本文指出，傅斯年持欧洲历史演进逻辑将“社会”的发育程度看作中国历史盛衰的主要指标，为他的自由主义式的社会改造方案提供历史论证，并力图呈现傅斯年及其领导的中国科学历史考据学背后的政治和思想性格，分析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附录二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变迁与分歧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又一轮“中西古今之辨”，意味着晚清以来出现的“中国文化”自觉意识得到接续和发展。本文批判性、反思性地回顾了30年来学界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认识和评价的变化与分歧，指出其中的思想意义和存在的问题，力求解释近十年来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热”、“中国文化认同意识”出现的历史机缘，分析其建设意义和隐含的盲点、误区，并尝试引出这样一种思考：当今之世，人文学者应怎样对自己所寄身的中国文化承担起严肃的建设责任。本文回应、补充了《导论》的内容。

自序

本书是我六七年间冥行擗埴的所得。

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师从瞿林东先生研读中国史学史。瞿林东先生是白寿彝先生的弟子，白寿彝先生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与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渊源甚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研究进至一个更加深入也更加多元的时期。继承“整理国故”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继续发掘、表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边缘和异端，阐发中国思想遗产中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现代性”因素，并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新“道统”，也指引着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变革方向。新文化运动时期，“天”变“道”亦变，“国学”成了“国故”，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从根本上丧失了真理性而被历史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观念更进一步地还历史语境化，致力于揭示那些“真理”形式的言说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转变、阶级构成及其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判定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的“进步”性与否。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和傅斯年也在提倡并实践与“中国哲学”不同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而更加强调“史”的意味，但他们所持的是“种族—文化—地理”史观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时，还活跃着以钱穆、蒙文通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他们站在大大

“落后”于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却也更加强调研究眼光和方法的“历史化”，强调将学术思想放在一个时代整体性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看其与政治、社会相关联而变迁的关系，所谓“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而其旨趣则在于讲出中国学术思想自身的条贯统系，借以针砭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和思想界的现状，很有为中国固有文化传统“招魂”的意思。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听师友们强调，研究中国史学史不能就史书论史书，而是要能将其人其书，放置于特定的时代社会环境之下，尤其应当注重史书作为一家之撰述，其中“史意”与当时政治、社会、思潮之间的相关互动。颂其诗，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不论其世。瞿林东先生尤能以宏观视野把握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特点，讲出一个时代的史学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治动向的密切关系，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史学在现实中回应历史挑战的思想活力，也激发着我们深入于这个伟大传统的责任意识。

开始学术生涯后，我总是想，以“史学”这一中国传统学术为途径，真正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打破古今心灵的隔阂，架起一座可以沟通古今的桥梁。在我读大学的80年代，中国历史开始重新选择自己的方向，接续晚清时代，又一次重新获得作为一种“文明”的自觉意识，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新展开中国文化的自我重建，也重建着自身历史、文明传统的连续性，并进入一个急剧全球化的时代，前所未有地、深刻地参与到现代世界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我所选择的学问方向，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事业，更是一种将偶在的人生与更深远、更广大的生命洪流连接在一起的方式，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努力求索人生意义的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本以经学、史学为主干，“史学”应该是进入中国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一个很好的进路。但是，我在阅读有关研究论著的时候，却感到一种强烈的不满，这些研究往往是从古代的史学文献中，以现代史学为标准寻找、摘取相符合的因素，然后拼接组装成了“中国传统史学”，它好像只是现代史学的胚胎、幼苗甚至是畸形儿——这也是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中”与“古”在“西”与“今”面前的基本存在样态，名曰“释古”或是“会通中西”，但其实却对“古”与“中”构成了一种遮蔽和

扭曲，甚至使之失语。我所追求的是，读古人之书，心知其意。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摆脱现代科学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框定和遮蔽，能用当代的眼光和语言，而如其本来地呈现其自身的形神面貌，并能提炼和把握弥漫、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之中的历史意识。我认为，只有使“古”与“中”成为使“今”与“西”相对化的真正的“他者”，才能使“今”与“西”产生真正的批判性的自我意识。

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连同史学史的研究，总的来说，是日渐没落衰微，同时也面临着研究范式上的转变。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或次经典，经过层层累积的阅读和阐释，很难翻出新意，引起关注，于是这些构成“传统”之骨架的“名著”，往往在并没有被充分研读之前就被排除出研究的视野，据我所知，在不少地方甚至都不是研究生课程的重点。有很多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学者，不是致力于提高通识和思想能力，而是遵照断代史和专门史的戒律，追求填补空白，做一些看起来实实在在的小题目，但丝毫不会触及整体图景的改写。在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学术潮流的影响，出现了将思想史与社会生活史相结合的号召，眼光从“大传统”下移到“小传统”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这一方向和方法的转变，在扩大研究领域和材料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成见”，具有改写整体版图的意义，也因此成为学术创新的有效途径，吸引着年轻学人的加入。我对这样的新趋势是很关注的，但同时也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感到很不满。比如，把“精英”和“民众”简单二分，“精英”作为有创造性的“文化昆仑”，并不能代表其时一般社会之情状，而“民众”则成了被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物质化的“人”，这样一来，也就难以看到历史上的“思想”背后具有主体性的“人”——他们面对迎头碰上的历史难题，在特定的时代局限下广求资源进行“思想”，力求导引历史的方向。再有，很多对新材料、新领域的研究，有“新瓶装旧酒”之嫌，不过是从“精英”、“经典”那里得出的现成观点的证明或反证。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强调“学术”创新的同时，越来越流失了“思想”的意愿和品质，而思想史之“思想”性的丧失与那种有历史主体意识、有整全历史视野的“思想者”的消失密切相关。“传统”之所以叫作“传统”，盖因为在那“过去”

之中，总可以发生出“未来”的萌芽，关键是我们要有那种在过去的遗产中点燃希望火花的能力，也就是“思想”的能力，也就是让现实具有想象力的能力。我在不少“眼光向下”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看到，研究者仅仅强调“回到历史”，仅仅强调“古”与“今”的巨大差异，好像“古”仅仅就是送进博物馆的怪异之物，供我们惊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努力追求的，我想，应该是将过去的遗产转化为“思想”的“活”的资源，让它向我们敞开未来的可能性，这才是思想史研究的“思想性”要义。

我博士论文的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瞿师希望我一方面开拓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新领域，一方面能从中国史学批判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理论上的把握和提炼。博士毕业后，我的主要精力也仍然放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上，而尤其关注宋代。但是，我发现自己的读书、研究和写作，处在一种困顿难行的境地，面对那个过去的世界，总是不得其门而入，不能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看古人古书的时候，其实戴着一副很难摘掉的“眼镜”，那就是自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以来累积形成的一整套阐释、构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化的观念条框。这就促使我走出“古代”的边界，来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开端时代——晚清民初，认真考察当时那些“扳道夫”式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再造文明”的意图下重新解读、阐释、结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他们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传统”，又在展示着“中国新文化”怎样的前途，那至今仍顽强规定着我们想象力的“典范”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如今能从中得到哪些正面和反面的教益。

钱穆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告诫学者，“向内莫忽了自己诚实的痛痒的真血性，向外莫忽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真问题”，要“以真血性融入真问题，从自性自格开辟一种真学问”，要“以学者为出发点而使用学问”。一个时代的学术尤其是史学，与这个时代整体的社会、政治、思潮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刻关系。一个历史学者，尤其需要时刻自问，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从事学术工作？这样的学术工作在时代的历史动力场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有着怎样的意义？应当以怎样的立场和方式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一自觉意识的要求也驱使我回到晚清民初，这个中国文化开始现代转型的时代，了解具有

典范意义的学人为什么又是怎样通过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书写重新发现和创造“传统”？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中，古与今是怎样相遇、碰撞和相互激发的？

这样一种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学习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事先不抱寻找论题写成论文的目的，而是按照每位学人的年谱，逐年地阅读《全集》和其他篇章，有所得有所感有所疑辄记之。在他们的文字世界中穿行，就像穿行于他们经过的历史时代、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而每读完一个人，一些问题、见解便自然地浮现出来，经过研究和论证，就形成了本书的各章。本书作为学术研究的客观价值如何，我个人难以判断，但这一阶段的阅读和写作对于我自己来说，确实是一次收获颇丰的学习。那些有关人生、历史根本问题的启迪，在思想方法上受到的冲击，情感上的深为所动，那种获得悟见、茅塞顿开的感觉，并不都能找到合适的论题，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自晚清以来到当代，确实是中国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时代，而那些具有路标意义的近代大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时代中的反应与作为，其实就是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格化表现，历史的大冲突在他们身上表现为自我的内在冲突，整个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崩解、撕裂、危机、冲突和斗争，其实都落实成了人心的地震，引起个体精神深处的破坏、失序和扭结，而这种更深刻、更内在的危机在那些敏感的心灵中是尤其严重和深沉的。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再造文明”的事业，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重新定义、架构和创造，从更深的层面来说，乃是要重建人生，重建此土生活世界的精神根柢，重新探求适于时而合于理的人格形态和生活理想。文明的再造、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首先是个体生命寻求出路、个人灵魂进行康复的事业。近代的大知识分子作为自负斯文在兹的承担者，他们在历史的变局中，发愿对固有文化价值系统进行整体性的、彻底的检讨和批判，首先是他们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内在的精神秩序发生了严重的不安、动摇和破坏；中、西、新、旧的冲突，生动具体地表现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所发生的紧张、困顿、纠结、矛盾；中、西、新、旧的调适和会通，其实是他们自求自得的调和、解决和超脱之道。他们的思想学说其实既非受之“外师”，也非录之“故书”，而是外感时势，内激性

情，批判性地选择和阐发“传统”，同时从“西学”、“新学”中汲取灵感，取诸其怀而铸成有血有肉的“胸府独见”。民国肇建，梁启超曾指出，处于过渡时代的中国，存在着重大的危机和险象，新、旧错综嬗变，思想根本不免随而动摇，“是非无标准，善恶无定名”，“分子游离而不相摄”，“人民彷徨歧路，莫知所适，现状之险，胡可思议？”他表示要效法中国史上大危乱之世的贤哲，深思明辨，调和新旧思潮发而为有统系的理想，讲出一套“人之所以为人，国民之所以为国民”之道，他认为这才是“因以开一代之治”的真正的开国事业。在袁世凯倒台的1916年，他说，“观社会中心力之迁移，为国民谋树思想上之新基础”，这与“查现今世界大势之所趋向，为国民谋辟生计之新纪元”是一样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的。章太炎以恢明而光大国粹自命，他追求的“大独”的境界是“儒墨之独”，“用心不枝，孑然与精神往来，其立言，诵千人，和万人”。这也意味说，当他真正求得了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出路，也就为此土斯民找到了大道所归。而这上下求索之路，又是多么漫漫而修远！

上述所见也关乎我对学术思想工作之根本意义的理解，对人文历史世界的探求所得，都将滴入个人的精神生命，使德性生命获得充实、成长和提升。这是我所追求的学问人生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自知秉性柔脆，能踉踉跄跄地走到现在，实在算是幸运。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向那些给我帮助、给我加持之力的师友亲人表示感谢。

感谢业师瞿林东先生，他引导我进入学术的门径，一直以来，他的指点、鼓励和督责总能让我振作起来，重新看到希望。他为人、做事、处世的态度，也让我终生受用。感谢齐世荣先生，他的学识风范给了我很深的影响，这位前辈大家让我亲身接触到一种“活”的传统，感受学术传承的意义，他常常教育我在当今之世，要能坚守所学所志。感谢刘家和先生，多次的受教让我领略到“典型犹存”及其意义。

感谢邹兆辰老师、刘新成老师，他们给了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工作的机会，这等于给了我学术事业成长的机会。

感谢这些年来相遇相知的师友，他们不仅对我的工作更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微斯人，吾谁与归！本书的意识、观点和想法，很多都得自

于和他们的交往、谈话以及对他们论著的学习。感谢吕正惠（淡江大学中文系）、赵刚（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光兴（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杨贞德（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系）、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戴景贤（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王璦玲（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刘人鹏（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林少阳（香港城市大学中文语言学系），感谢陈慧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罗新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冯金红（三联书店）、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谢茂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牟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凯（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父母兄姐的爱，就像包裹着我的大气层一样，对于他们的感谢，难以言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我的爱人张志强，我们把生命种植在一起，一起努力地生长着。

江湄

2013年初春于京西寓所

目 录

各章内容提要	1
自序	5
导 论 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与“传统”的创造	1
一 “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1
二 平视“五四”与“晚清”	10
三 思想史研究和超越五四的中国新文化	19
第一章 梁启超的“学术”观念及其儒学性格	25
一 晚清今文经学对儒家“大学”之道的回归	26
二 学术、人才、风俗与政治	33
三 “科学之上不可不更有身心之学以为之原”	39
四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42
五 结语	49
第二章 “事上磨炼”的“新道学”	
——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及其思想意图	51
一 引言	51

二	“日损之道”与“日益之学”	54
三	梁启超的“新文化运动”方案	60
四	孔学本意：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宗教	66
五	回到“晚明”去	70
六	从戴震、颜李到阳明学	75
七	余论	84
 第三章 “新史学”之“新”义		
	——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观中的佛、儒思想因素	87
一	以“佛之说因果”明“人群进化之因果”	88
二	“人类将来之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	95
三	“回心”之变与“适时”之变	98
四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故报”	102
五	结语	109
 第四章 “齐物”世界中的“学术”“道德”“风俗”与“政治”		
一	从章太炎为魏晋士风翻案说起	113
二	“学术”以“真理”为归趣	116
三	“学术”与“成德”	120
四	不以“真谛”坏“俗谛”	126
五	“分异政俗，无令干位”	131
六	结语：“齐物”的世界	136
 第五章 章太炎“六经皆史”说本旨、意涵及其变化考论（上）		
	——以《春秋》学三变为中心	139
一	引论	139
二	《春秋》“义经而体史”	143
三	孔子诚不制“礼”	149
四	“疑古”思潮及其对《春秋》《左传》的科学研究	152